



# 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问题初探\*

方燕明

**摘要:**考古学文化所对应的夏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先夏)—王湾三期文化(先夏与早夏)—新砦期(后羿代夏)—二里头文化(夏中晚期)。中原龙山时代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各种文化逐鹿中原,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由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终至夏王朝诞生在中原腹地——嵩山地区。其时,大禹治水体现的行政组织与管理机构的存在,禹画九州对固定地域实施的统治与贡赋制度的出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即监狱的出现,武力征服导致频繁战争,考古所见社会分层与分化的材料,血缘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取代——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体现王权的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滥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成熟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上表现大体对应了早期国家的若干特征,反映出国家的初级形态即早期国家——夏王朝的样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以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花地嘴和东赵等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

**关键词:**夏文化;早期夏文化;早期国家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2-0013-10

早期夏文化是夏文化研究中的难题之一,其中既有材料问题也有年代问题。本文以笔者数十年积累的考古材料和多年思考为基础,从若干概念出发,对早期夏文化研究中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战争与祭祀、治水、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展开讨论,并将早期夏文化置于“早期国家”框架中进行研究,就考古学探索虞夏时期的遗存,提出若干认识。

## 一、几个概念界定

关于“夏文化”,徐旭生指出:夏文化这个词包含两种含义,即夏代文化和夏族文化,两者在

时间和地域范围上都不尽相同<sup>①</sup>。夏鼐认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sup>[1]</sup>。邹衡提出:“夏朝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夏文化指的又是夏王朝所属考古学文化。”<sup>[2]</sup>近年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夏文化与夏王朝分别看待,将文化与政权属性脱钩,将夏文化定义为“夏族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化”,那么从考古遗存上来界定夏文化也许更顺畅、合理<sup>②</sup>。这种新的思路有助于在考古学上进一步认定夏文化遗存。

“早期夏文化”是夏文化研究中极其重要而又无法绕开的话题,其概念厘清和内涵认定对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1996—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子课题“夏年代学的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提出:早期夏文化研

收稿日期:2023-08-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22JJD780006)。

作者简介:方燕明,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99),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前考古与三代考古研究。

究是确定夏王朝始年的关键,讨论对象主要集中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一期遗存上,通过进一步研究,可望得出倾向性的结论<sup>③</sup>。在夏文化探索中,出现了早期夏文化和先夏文化两个概念。有学者认为早期夏文化是夏代的早期文化,不包括夏立国前夏族所创造的文化。至于先夏文化,是指夏族渊源时期的文化<sup>④</sup>。我们在夏代年代学的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中,探索对象既包括夏代早期文化,也包含先夏文化,如此方可弄清夏文化的始末。

关于早期夏文化,邹衡指出:如何在考古学上确定夏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以及社会发展阶段五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即夏文化。至于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不是夏文化,倒是可以讨论的<sup>⑤</sup>。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夏文化探索,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已成为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鉴于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学界已将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遗存作为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关于早期国家,有研究认为,综合中外相关理论可将早期国家特征归纳为五条:早期国家拥有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或者称之为统治者、统治集团;早期国家拥有与中央权力的实施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包括官署(亦称官僚系统)、军队、监狱等;早期国家所处的社会是社会分层高度发展的社会;早期国家有针对某个固定地域实施统治的概念;早期国家有支持其合法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因,则可能与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地域、生产的进步、战争、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政治发明等相关因素有关<sup>⑥</sup>。在考古材料中,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和统治集团的出现,大禹治水体现的政治权力的实施和社会管理,社会分层分化高度发展的材料,禹画九州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所表现出对固定地域的统治等,这些材料可以作为探索夏王朝——早期国家重点考察的对象。我们认为在界定和认同上述重要概念的基础上,突破古史传说和考古材料整合研究的年代瓶颈和

材料瓶颈,将有助于推进早期夏文化研究。

## 二、问题讨论

早期夏文化是夏文化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主要表现在考古材料不足和年代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考古材料方面,与早期夏文化相关的考古发现还没有达到二里头文化的水平,如二里头遗址都邑的井字形或九宫格式布局(包括宫城、祭祀区、墓葬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等)、大型宫殿和宗庙、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龙形器等。在年代上,关于夏代始年,学界认识不一:或公元前1800年左右,实为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其与由文献记载夏积年471年推定出的夏始年明显不符;或公元前1900年,这是新砦期遗存的上限,新砦期遗存或与文献中的“后羿代夏”有关,显然此时夏王朝已经建立,否则何来代夏一说;或公元前2100年前后,这是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年代,大体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当。

早期夏文化的问题,或表现出夏王朝早、晚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历史学角度看,禹至少康时期仍为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下的世袭制,国家尚未形成。夏杼以后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才为国家机构所代替,氏族社会即将发展到阶级社会<sup>⑦</sup>。从考古学角度看,传统上所谓的“夏朝”,在它的早期,即从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阶段,可能还不具备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最早的具备国家水平的社会,可以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考古记录里加以确认<sup>⑧</sup>。显然,夏代国家的建立过程比较漫长,如此将夏王朝称作“早期国家”比较合适。

在夏文化探索中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是,夏商周时代已处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这时的文化遗迹和文化遗物应采用历史学上的命名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但是目前有些重大学术问题还没有获得历史学的最后解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在考古学范围内作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进行探索。在考古学上确定哪些考古学文化属于夏代文化,乃是探索夏史的核心<sup>⑨</sup>。可见,考古学研究依然是探索夏文化的主战场。笔者基于数十年来在早期夏文化考古中积累起的大

量资料和多年的思考,对与早期夏文化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其一,关于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sup>[3]</sup>为学界所熟知。三代王朝政权的建立和更替大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如尧舜禹征三苗、禹攻共工和有扈等与夏王朝的建立,商汤伐桀与商王朝的建立,周武王伐纣与西周王朝的建立等。夏王朝立国前后的战争,主要表现在王朝的建立、王朝的巩固、失国与复国等国之大事上。唐尧虞舜已进入龙山时代,唐尧或与陶寺早中期文化同时,虞舜由东方迁晋地后或与陶寺中晚期文化相联系。在尧舜时代发生的尧放四凶、尧攻丛枝和胥敖、尧伐西夏、稷放丹朱、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攻共工和有扈等战争,大都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禹、启伐有扈氏、启征西河、启益之争等战争,都与巩固王朝有关;羿浞代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复国之战等,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杼(宁)、槐(芬)征东海开创了夏王朝东向发展的新局面。至于战争的原因,可能与其时中原地区的土地和农业经济所承受的人口压力较大有关。陈淳认为,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维持社会发展和国家运转,就必然会导致频繁的兼并和掠夺战争。这种为地位、资源、土地、人口而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成为推动早期国家向更加复杂结构发展的动力。对于早期国家来说,国家机器主要是战争机器,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完全建立在武力之上<sup>①</sup>。

其二,祭祀活动。夏代早期祭祀遗存的分布规律与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位于宫城北部、宗庙位于宫城东北部相同。显然,祭祀遗存位置固定于都邑的中北部或东北部,这一传统在夏代早、晚期之间是有传承的。夏代祭祀活动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如夏代早期的王城岗遗址祭祀区面积有数百平方米,瓦店遗址祭祀建筑面积约800—1000余平方米,新砦期或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到夏代中晚期,二里头遗址祭祀区面积达五六万平方米,其中与墓地有关的小型祭祀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而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宗庙)的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其中主殿面积为400多平方

米),四号宫殿台基面积为470余平方米。可见祭祀活动在夏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持续强化和发展。夏代早期祭祀建筑以埤类遗存为主,如王城岗遗址祭祀奠基坑和一些夯土坑、夯土残迹,可能与埤类祭祀建筑相关。以瓦店遗址WD2F1为代表的埤类祭祀建筑,其夯土基础的修筑技术与王城岗夯土祭祀奠基坑相同,而且与二里头宗庙建筑的夯土基础的修筑方式如出一辙。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遗址的祭祀建筑亦以埤类建筑为主,如二里头遗址小型埤类建筑与一些墓葬的祭祀活动有关,而大型祭祀活动主要在大型建筑如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宗庙)和四号宫殿(宗庙)中进行,同时祭祀内容愈加丰富。这些祭祀遗存是夏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真实写照<sup>②</sup>。

其三,禹画九州。《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如下:冀州,没有注明范围,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sup>③</sup>。从考古材料看,龙山时代诸考古文化的分布与《禹贡》“九州”地域吻合大概率应属巧合,其实“九州”地域的划分与山川地理形势大致相合,而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也与地理环境大体对应。当然,禹画九州或反映出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演进,或表现出早期国家对固定地域的控制。同时,《禹贡》“九州”中的贡赋内容亦十分重要。

其四,关于治水。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大致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段,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气候多变,容易发生洪涝灾害。我们认为:一是洪水发生的时间大体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而大禹治水约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二是西周青铜器遂公盃铭文中有关大禹平土治水的事迹,使记载夏史的文字资料由春秋提前到西周中期,早了六七百年。三是治理洪水的人主要是华夏集团的共工、鲧、禹、四岳等,已有考古材料表明,共工之城或为辉县孟庄古城,鲧作之城或为登封王城岗小城,禹居阳城或为王城岗大城。四是治理洪水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共工和鲧为代表的“窒塞”,即把高地铲平,把低地填高,可以从共工之城即孟庄古

城和鲧作之城即王城岗小城的筑城特点寻找到一些“窒塞”的痕迹；另一类是以大禹为代表的“疏导”，一方面把散漫水道中的主流水道加宽加深，使水有所归，另一方面，疏引沮洳的地方，使之干爽，可以从登封王城岗大城壕的修筑发现“疏导”的遗存。大禹治水的庞大工程，表明其时社会组织与管理水平较高，也是夏禹时期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sup>③</sup>。

其五，“敬授民时”。《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sup>[4]</sup>。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4100年前的观象台，该建筑为圆弧形高台基，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的核心部分是呈弧形排列的13个夯土方柱，相邻夯土柱间距15—20厘米，形成放射状的狭缝，汇聚处有一个夯土制成的圆心。发掘者推测这个建筑是集观象授时和祭祀功能为一体的礼仪建筑，圆心就是观测点，通过12个柱间狭缝观测日月星辰，据此制定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节令历法<sup>④</sup>。作为尧都的陶寺遗址，早在4000多年前就出现了“敬授民时”的活动。

其六，关于夏代血统多源。学界普遍认为族群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一般认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只能对应一个族群。据此，若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早于和晚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就都不是夏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打破一种考古学文化对应一个族群、王朝和文化的限制，提出构成夏族群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夏王朝应该已突破血缘社会的藩篱，步入血统多源的地缘社会。

关于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的关系，林沄提出，中国国家起源的动力问题研究还应该加强；《尚书·尧典》涉及国家起源相关问题的论述，从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需要重点探索的问题：第一，“敬授民时”，强调了历法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第二，治水在早期国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三，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凝聚超血缘关系人群集团的组织能力的重要意义<sup>⑤</sup>。前述讨论中的第一至三项与文献记载的国家起源有关，而第四、五、六项与林沄对于推动国家形成的动力方面研究应该着重下功

夫的几点建议大致相同。我们认为在考古学文化尚不能与夏族、夏文化、夏王朝完全对应的情况下，可以将“早期夏文化”置于“早期国家”的框架中开展研究，观察与早期夏文化相关的遗存是否达到文明社会——早期国家之水准，此举将有力推进夏代早期文化研究。

### 三、若干认识

前述对“早期夏文化”和“早期国家”等概念的界定和确认，结合对早期夏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认识。

####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夏文化

综合中原龙山文化研究，可将考古学文化中独立且特征明显的陶寺·三里桥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石峁文化，以及地处几种文化交会处的王油坊类型等列出发展序列。

晋西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陶寺·三里桥文化—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豫西中部地区：大河村五期类型（或谷水河类型）—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豫北冀南地区：台口一期类遗存（或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下七垣文化。

关中地区：浒西庄类型（或案板三期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或东龙山类型）。

豫东鲁西地区：段寨中期类遗存—王油坊类型（或造律台类型）—岳石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城子崖类型—岳石文化。

河套地区：本地龙山文化前期—石峁文化早期—石峁文化晚期（或朱开沟文化）。

将以上诸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结合来看：王湾三期文化的北部有陶寺·三里桥文化，或为唐尧遗存；其东北有后冈二期文化，或为先商遗存；其东部有王油坊类型（或造律台类型），或为有虞氏遗存；其南部有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或为三苗遗存；其西北有客省庄二期文化，或为先周文化；石峁文化或为北狄遗存。故居于诸文化中心的嵩山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的可能性最大。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1600年为夏商分界，

以文献中夏积年471年前推得出夏始年为约公元前2070年<sup>⑧</sup>,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已进入夏始年。综上,我们认为考古学文化所对应的夏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先夏)—王湾三期文化(先夏与早夏)—新砦期(后羿代夏)—二里头文化(夏中晚期)。中原龙山时代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各路文化逐鹿中原,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由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终至夏王朝诞生在中原腹地——嵩山地区。

张光直指出:“文明的基础是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很贫乏的文化,很难产生我们在历史学上或考古学上所说的那种文明。”<sup>[5]</sup>前述诸考古学文化谱系,结合徐旭生提出的夏族主要起源于晋南、豫西地区的观点看:晋西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清凉寺墓地显示社会分化与阶级对立,陶寺·三里桥文化陶寺城址和周家庄大型聚落雄踞晋南,凸显王权,陶寺城址可能为尧都平阳;豫中西部,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嵩山地区以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等城址为代表,王城岗、瓦店遗址很可能与禹、启的阳城、阳翟、钧台、夏邑和夏台相关联,新砦遗址可能与后羿代夏事件有关系,其时生产发展,技术垄断,出现大型水利设施,人口增加,出现城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礼仪发展,社会分层和分化加剧,出现阶级;主要由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主体遗存,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其时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国家——夏王朝,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出现成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 (二)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

我们认为早期夏文化研究的瓶颈大体在于已有的考古发现尚未达到二里头文化的发展水平。有鉴于此,可以通过梳理与早期夏文化相关的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郑州东赵等遗址的考古材料,看其是否已经达到早期国家的标准,这些标准大体上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1. 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出现早期城市

生产发展在各个遗址的考古发现中都有所体现。王湾三期文化,生产的发展促进人口的增加,战争频繁,竞争激烈,聚落与社会发生较

大变化,出现早期城市。农业生产水平有明显提高。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有粟、黍、稻、豆种等作物,野大豆、藜种、紫苏、菊种、土荆芥等植物<sup>⑨</sup>。禹州瓦店遗址发现的植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和黍亚科、豆科、藜科、莎草科、大戟科、葫芦科、蓼科、苋科等常见的杂草,以及野大豆、紫苏、葡萄、水棘针、酸枣、野山楂、桃等。瓦店遗址发现的五种农作物即粟、黍、小麦、大豆和稻谷,这与史料所记载的“五谷”之数恰好一致,瓦店人群以种植粟、黍为主,兼营稻谷、大豆和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另外大量出土紫苏,紫苏具有药用和食用等多种价值。瓦店遗址还出土一定数量的水稻小穗轴,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很可能与稻作农业的生产加工相关<sup>⑩</sup>。生产工具主要为石质,但磨制得比前一阶段精细,打制工具已极少见,大量使用蚌器。木耒是一种挖土工具。锄类农具有扁平长方形石铲和方形厚壳蚌、骨锄。另有三角形犁形器。这些改进的生产工具,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收割工具有长方形穿孔石刀、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和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劳动收获量的增加。石斧是砍伐工具,小型石铤和石凿是木工工具<sup>⑪</sup>。

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家畜饲养业的兴旺,增加了家畜的品种和数量。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猪的数量最多,有的墓葬用猪头随葬,这虽是一种宗教习俗,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的无脊椎动物有蜗牛、中华圆田螺、圆顶珠蚌、丽蚌、蚬等,脊椎动物有牛、羊、猪、狗、熊、梅花鹿、豪猪、兔鼠、家鼠、鸟等<sup>⑫</sup>。禹州瓦店遗址发现的家畜有猪、黄牛、绵羊、狗等。牛骨是当时制作骨器的主要原料。猪、牛、羊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瓦店的野生动物比例呈逐步下降趋势,饲养家畜成为先民获得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渔猎业为辅助性食物提供来源。狩猎的主要工具是石、骨、蚌簞。主要猎获物有鹿、麋、兔和獾等。遗址中常发现骨鱼钩、石和陶的网坠等捕鱼工具,还有大量的田螺、蚌壳及鱼鳖等食余弃剩物<sup>⑬</sup>。

手工业主要门类有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蚌器、漆木器的制作等,还出现了铜器制作。其

中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是人们劳作和生活的两项重要技术。陶器制作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在陶窑烧制陶器的过程中,人们还掌握了烧制灰陶和黑陶的闭窑和渗碳工艺,还有用高岭土制作白陶的技术。石器中普遍采用以砂水为介质的石料切割和钻孔技术。经过对登封王城岗出土部分石器不同生产阶段产生废坯的观察,大致复原了石铲、石刀和石斧的制作工序。石铲首先在原料产地直接打制成粗坯,再将粗坯运往聚落加工;石刀和石斧则是将石料运到聚落中打制成粗坯。石铲和石刀都有钻孔,但石铲采用单面管钻的技术,而石刀则是两面实心对钻。另外,对石铲废弃品二次利用的程度明显要高于石刀和石斧。石铲和石刀是王城岗龙山时期生产工具的主要种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两者制作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品和废品考察发现,石铲的生产过程比石刀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技术水平也更高。导致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原料的获取有关,更重要的技术上的差异可能与不同石器的功能有关。禹州瓦店遗址石铲实验考古表明,石制品制作过程包含选取原料、切割材料、打制成型、琢磨加工、钻孔工艺等多个方面,石铲生产处于松散的专业化生产状态,其时的嵩山地区夏商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灰岩石铲工业,这种专业化生产的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sup>②</sup>。

贸易与技术垄断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体现,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的精美遗物中,玉器是透闪石软玉,其原料不见于当地,可能交换自外地。瓦店遗址的海贝来自远程交换。白陶器成分为高岭土,烧制白陶的技术龙山晚期才出现于颍河中上游地区,白陶器仅在大型遗址中发现,似乎表明其技术很可能为当时社会上层所垄断。精致的磨光黑陶主要为制作精美和纹样别致的高档陶器,包括胎极薄的蛋壳陶、花纹陶和大型磨光黑陶,其制作技术高超,很可能也垄断在高等级的聚落中。瓦店遗址发现列觚这种特殊用途的陶器,成套量器列觚可能与赋税制度或产品的再分配有关。登封王城岗城址长达600多米的北城壕,其地表高差达4.35米,但城壕底部高差不足0.40米,可见龙山晚期的人

们已经掌握了水平测量和施工技术,这种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城壕设计和开挖,联系大禹治水的传说,具备一定的测量和施工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增加了大禹治水的可信度<sup>③</sup>。

人口增长较为明显。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人口规模在200多万人,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69人。通过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分析,可以初步确定这一时期的遗址人均占地面积为151平方米。按照遗址的人均占地面积以及遗址面积的数值,可计算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聚落规模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通过对目前发现的不同人口规模的聚落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将这一时期的聚落分为四个等级,其中人口规模在6500人以上的聚落为第一等级,人口规模在2000—6500人的聚落为第二等级,人口规模在1000—2000人的聚落为第三等级,人口规模在1000人以下的聚落为第四等级。

从不同人口规模的聚落分布情况来看,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豫西、豫中、豫北等为中心形成几个大的聚落群。不同聚落群之间在人口规模以及分布格局上存在较大差异。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在聚落形态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城址的大量出现,这些城址位于各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周围有数量不等的各级聚落分布。城址人口规模上的差异,只是反映了位于城内的上层人物的多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聚落形态的发展表明,聚落之间的等级差异十分明显,城乡分化进一步发展<sup>④</sup>。依上述聚落分级,禹州瓦店遗址(7000—10000人)相当于第一级聚落,登封王城岗遗址(4000人)、新密新砦遗址(4600人)相当于第二级聚落,新密古城寨遗址(1100人)相当于第三级聚落,郑州东赵遗址(600人)相当于第四级聚落。我们发现,依林沅“各种类型的邑大体保持着 $150 \sim 160M^2/户$ 的指数”<sup>[6]</sup>,王城岗龙山文化东西小城约2万平方米,户数约130户,人口约500人;王城岗龙山文化大城34.8万平方米,户数约2300户,人口约1万人。若依王建华的人均占地面积为151平方米推算,王城岗龙山大城仅2500人左右。如依林沅户均占地面积推算,瓦店龙山都邑达100万平方米,户数约6600户,人口约2.6万人;若依王建华,瓦店都邑仅约7000人。可见,关于龙山时期都邑的人口

规模还有不小的讨论空间。但龙山文化后期较前期人口增长幅度较大是毋庸置疑的,龙山文化后期遗址数量远超龙山文化前期就是明证。

关于早期城市的出现,张光直指出:中国早期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象征,而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并提出分辨我国城市的五条标准:夯土城墙、战车、兵器;宫殿、宗庙与陵寝;祭祀法器与祭祀遗迹;手工业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sup>⑤</sup>。早期城市的出现,可以作为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代表之一。

目前已发现中原龙山文化城址 17 座:陶寺文化(或唐尧)城址 2 座,分别为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环壕);王湾三期文化(或先夏和早夏文化)城址 7 座,分别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郑州东赵、漯河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后冈二期文化(或先商文化)城址 6 座,为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安阳后冈、安阳柴库、濮阳戚城;王油坊类型(或有虞)城址 1 座,为淮阳平粮台;客省庄二期文化(或先周文化)城址 1 座,为西安太平(环壕)。城址面积,其中陶寺为 280 万平方米,王城岗为 34.8 万平方米,瓦店为几十万平方米(瓦店除了城墙,还有纵横交错的壕沟,城池面积达 100 多万平方米),古城寨约 17 万平方米,孟庄为 12.7 万平方米,平粮台约 5 万平方米,蒲城店和郝家台均为 3 万余平方米。这些大型城址和中心聚落的出现,固然是新技术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动员、组织实施这类大型工程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sup>⑥</sup>。

这些城址大都具有夯土城垣,其中古城寨城墙高耸于地面,高达 5—16 米。有些城址内布局结构复杂,如王城岗城址显示出定向上的规律性(小城之东城北偏西 2°、小城之西城北偏西 4°,大城北偏西 3°,大小三城方向在北偏西 2°—4°之间)。

瓦店遗址纵横交错的壕沟构成功能分区:西北有高等级建筑区,如 WD2F1 祭祀遗址面积达 800 平方米,以及 WD1TJ1、WD1TJ2 和 WD1TJ3 建筑基址群等;东南有成排房址和墓葬构成的居葬一体的普通居住区,另外有石器作坊。瓦店城址的夯土建筑方向也表现出在定向上的规律性,其大都为北偏东约 30°。

古城寨 F1 和 F4 由夯土主殿台基(面积 360 平方米)和回廊组成的面积近 1000 平方米的四合院式建筑,具备早期宫室的基本特征,南北缺口(或为城门)对应,或由道路将城内进行分区。

郝家台城址内分布有成排房址和墓葬,体现出居葬一体的特点;平粮台方正形城中以道路为中轴线,道路贯通南北城门,在道路两侧分布有成排房址和墓葬,体现居葬一体的格局,城内还铺设陶排水管道和沟渠一起构成排水系统。凡此种皆表明在中原龙山时期,已经出现了有规划的早期城市。

新砦期有大型城址、建筑基址、祭祀遗迹、灰坑、墓葬等。农业生产方式有可能向旱作农业转变。对人骨的同位素研究,发现他们的饮食以黍、粟为主,其时的新砦稻作农业发达,但平民却以小米为食,或许表明这与社会分层、人群分级有关。陶器制作技术发达,古耕地研究和石器岩性分析,玉器、红铜器的加工技术分析,为了解新砦期遗存的聚落形态提供了新资料。刻画精美的龙形图案陶礼器的存在,表明这时已有成熟的精神文化活动<sup>⑦</sup>。

新砦期城址 5 座:新密新砦(70 万平方米)、巩义花地嘴四重环壕(遗址面积 30 万平方米)、郑州东赵小城(2.2 万平方米)、平顶山蒲城店(5 万余平方米)和淮阳时庄仓城(0.5 万平方米,遗址面积 10 万平方米)。从已公布的材料看,新砦、花地嘴和东赵属于新砦期遗存,而蒲城店和时庄的文化属性可能只是进入夏纪年的龙山时期最晚期的遗存<sup>⑧</sup>。

前述对中原核心地区以王城岗、瓦店、新砦等遗址为代表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为其时的生产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为众多城市的出现与竞争和战争的发生等,提供了讨论的新材料。

## 2. 社会分工细化,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

社会分工不但发生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也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如陶器、石玉器、骨角蚌器、漆木竹器制造,可能还有冶铜业等,这引起了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和多样化,促进了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活动的发展。在王城岗、瓦店、郝家台和平粮台等遗址中发现有零星的长方形竖穴墓,其中少数有随葬品。在房屋附近、房基下、墙基下、散水下甚

至柱洞下发现有婴儿墓,有的有瓮棺。这些小孩墓,有的可能与房屋建筑时的宗教活动有关。灰坑等遗迹中常发现人骨架,有的凌乱,有的整齐,显然为非正常死亡,或为社会分化的表现。有学者将这些见于各类非墓葬遗迹中的死亡者,称为“异类葬”;并认为龙山文化“异类葬”较流行,多与人牲有关。这些死亡者是最低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甚至如同动物那样被处置。异类葬是说明社会分层、人群分等、人际或族际关系相当复杂的最佳材料,是人类社会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sup>⑧</sup>。

不同阶层和阶级产生。龙山中晚期遗址中卜骨的存在,表明这时可能已有在社会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专职巫师。许多遗址中发现大量卜骨,是用猪、羊、鹿和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上有火灼痕。卜骨作为占卜用器,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载体。瓦店祭祀遗迹分为小型和大型两类。小型祭祀遗迹位于遗址东南部,祭祀遗迹大体为圆形(直径2—3米)<sup>⑨</sup>。大型祭祀遗迹位于遗址西北部,WD2F1祭祀建筑为长方形,南北长约31米,东西宽约26米,其面积约800平方米,在祭祀建筑表面分布有大量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如人牲(有数十人,大都被肢解)、动物牺牲(有猪、狗等),燎祭红烧土、瘞埋坑(出土大量陶器,包括九鼎五瓮,表明此时礼仪制度的发展,或为“九五之尊”观念的滥觞)、五谷坑。祭祀以后的宴飨活动遗迹有出土大量螺蚌的坑等<sup>⑩</sup>。“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得到很好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瓦店遗址祭祀遗迹中,主持祭祀的统治者、巫师和祭祀中的人牲、平民等,这些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应该属于不同阶层和阶级。

### 3. 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我们通过王城岗遗址模拟实验,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来修筑王城岗这样一座30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如果以1000个青壮年劳力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需要连续工作1年零2个月的时间。若再加上进行设计、测量、管理和监督的人员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修建如此规模的工程所需劳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内其他聚落的劳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期的颍河上游地区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

群,而这个聚落群的社会内部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如果简单地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一年多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村落的劳力。这与目前所调查的颍河上游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基本吻合。因此,其时可能已产生统治阶级,出现社会管理组织,很有可能是王城岗城址中拥有王权者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该工程<sup>⑪</sup>。

王城岗遗址与“地中说”可能是权力不断强化的表现之一。中国天文学史上有“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重要观念。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结合山西陶寺城址和登封王城岗城址考古学和考古天文学的新发现,认为“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观念产生于国家建立之际。尧都陶寺和禹都阳城王城岗的日影观测结果表明,两个地点观测到的夏至日影分别为1.6尺和1.5尺,即《周髀算经》和《周礼》所记载的两个夏至日数据。陶寺与王城岗之间的直线距离接近当时的1000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日影测量和大范围地理测量相继开始的特殊时期,由此产生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理论观念。从尧舜禹到西周,政权交替或都城变化都伴随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变化,说明“帝王所都曰中”源自“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地中或中土成为群雄逐鹿、八方向往的中心,这里是王基所在、国祚之源<sup>⑫</sup>。有学者认为:“天下之中的空间定义与有夏之居的历史认知紧密相连……从考古学角度看,周人选择在嵩山南麓王城岗城址附近设测景台,声称嵩山为天下之中,而非选择丰镐、晋南、郑州或其他位于周原与安阳之间重要的战略地点,表现出周人希望继承王城岗一二里头历史传统的政治理想。”<sup>[7]</sup>

### (三) 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动力”及物质遗存表现

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动力”一直是西方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课题,近几十年在中国学界也有所涉猎,产生了多种观点,主要有:国家起源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分

化,人口增长压力、社会竞争和战争,大规模水利和灌溉系统的兴修与管理,贸易竞争与垄断,宗教礼仪的作用等不同学说<sup>④</sup>。“原动力”具体到考古研究中,可以提炼出如下一些特征:国家应有大型都邑或城市,多层次聚落结构、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不同等级和功能的公共建筑或设施,不同等级的权贵墓葬,体现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大型公共工程,集中管控并服务于权贵的高端手工业,尤其是有体现王权或最高权力特征的宫殿、王墓、神庙等<sup>⑤</sup>。考古材料中,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嵩山地区城池林立,是社会竞争和战争频繁的表现;以中心聚落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等聚落群为代表的四级多层次聚落结构的出现;公共建筑如大型夯土建筑,包括古城寨回廊式宫殿建筑、瓦店祭祀遗址、新砦祭祀遗址等;权贵墓葬或以叶县余庄高等级墓地为代表;大型水利设施如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对水的治理和水利设施的存在,表明其时已出现社会组织管理机构;王城岗、瓦店、新砦等对资源的控制、技术的垄断,瓦店远程交流与贸易的发生;王城岗、瓦店、新砦成熟的祭祀与礼制,王城岗“地中说”和“日影千里差一寸”与王权的关系;王城岗、瓦店、新砦等农业(五谷)、畜牧业(四畜)发展和手工业技术进步;异类葬和祭祀活动表现的社会分层和分化加剧;白陶和磨光蛋壳黑陶、制玉等高端手工业被中心聚落权贵所控制使用。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发现以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构成的夏文化,其时,大禹治水体现的行政组织与管理机构的存在,禹画九州对固定地域实施的统治与贡赋制度的出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即监狱的出现,武力征服导致频繁的战争,考古所见社会分层与分化的材料,血缘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取代,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体现王权的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滥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成熟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凡此种种,大体一一对应早期国家的若干特征,反映出初级形态的早期国家——夏王朝的样貌。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夏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将豫西嵩山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的考古材料与早期国家的若干特征相比较可知,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以王城岗、瓦店、古

城寨、新砦、花地嘴和东赵等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

#### 注释

- ①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②戴向明:《夏文化、夏王朝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③⑩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03页,第81—82页。④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⑤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⑥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1、53—64页。⑦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7页,第71、169页。⑧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⑩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9页。⑪方燕明:《夏代祭祀遗存初探》,上海“考古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2023)论文。⑫尹世积:《禹贡集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⑬方燕明:《中国古史传说之洪水说与大禹治水诸史迹的考古学观察》,载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201页。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⑮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⑯⑰⑱⑲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516—534页,第630—644页,第574—602页,第795—799页,第657—663页。㉑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㉒方燕明:《近年禹州瓦店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载张弛等:《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成果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137页。㉓北京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630—644页;方燕明:《近年禹州瓦店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述》,载张弛等:《区域、社会与中国文明起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成果集》,第120—137页。㉔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科学出版

社2011年版,第292、293页。⑳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㉑方燕明:《河南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六十年》,《华夏考古》2012年第2期。㉒赵春青:《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方法》,《考古》2009年第2期。㉓方燕明:《河南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六十年》,《华夏考古》2012年第2期;张家强:《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载《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5页;曹艳朋、张海、杨苗圃、陈艳:《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粮仓城》,载《202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58—62页。㉔刘绪:《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5页。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禹州瓦店遗址WD2F1建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6期;方燕明、梁法伟:《禹州瓦店龙山时期WD2F1祭祀遗存初探》,《华夏考古》2021年第6期。㉗徐凤仙、何弩:《“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赵永红:《〈周髀算经〉与阳城》,《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㉘戴向明:《简论中

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载《黄河流域史前时代》,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8—410页。㉙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 参考文献

- [1]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河南文博通讯,1978(1):32.
- [2]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1979年5月在成都“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M]//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27.
- [3]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4149.
-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
- [5]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M]//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论丛:第1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14.
- [6] 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6):3.
- [7]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J].考古学报,2017(3):301.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arly Xia Culture and the Early State

Fang Yanming

**Abstract:** The Xia culture, to which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correspond, has experienced from the late Miaodigou phase II culture (pre-Xia), the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pre-Xia and early-Xia), the Xinzhai period (Houyi replaced the Xia), and the Erlitou culture (Middle and Late Xia).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in the Longshan period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various cultures raced to it, making central plain the center area.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pluralism to integration, assimilation and continuity, finally the Xia dynasty was born in Songshan area of the hinterland of central plains. At that time, the existence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embodied in Dayu flood control, the emergence of Yu's delineation of nine states' rule over fixed areas and the tribute system, Xia Jie imprisoned Shang Tang in Xia Tai, which is the appeared of prisons, the military conquest leading to frequent war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seen in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and the gradual replacement of blood relations by regional relations, meant the emergence of a wide-area kingship state in Erlitou, the palace, temple and other high-grade buildings that reflect the royal power originat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Longshan culture and matured in the period of Erlitou culture, the above performances correspond to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ly state in general, and reflect the appearance of the primary form of the state of Xia dynasty. The late phase of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and the Xinzhai period, together with the early Xia culture, represented by Wangchenggang, Wadian, Guchengzhai, Xinzhai, Huadizui and Dongzhao sites, have entered the early state.

**Key words:** Xia culture; early Xia culture; early state

[责任编辑/启 轩]